

高等学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 组编

资 政 育 人

高校党史教育论丛

(2015)

下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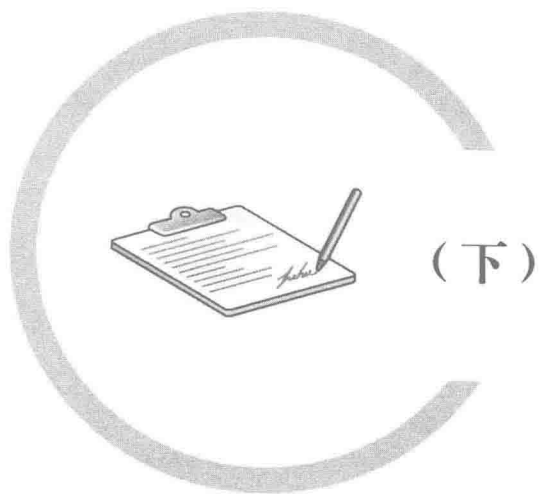
光明日报出版社

高等学校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 组编

资 政 育 人

高校党史教育论丛
(2015)
下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三个议题

中国人民大学 宋学勤

新时期以来,中共党史研究进展迅猛,取得了丰硕成果。回顾这些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历程,中共党史研究的观念和方法既得到了宝贵的值得推广的经验,也出现了一些值得进一步反思的现象。^①如何在当前复杂的学术氛围中发掘出中共党史研究的真谛和党史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必修课”。

一、问题意识的养成

“问题意识”问题,是包括中共党史学科在内各个研究领域的一个前置性问题,对其如何回应和给出什么样的回应,直接决定着一个学科或者研究领域的价值和发展命运,是一个带有根本性且必须给予确定性回答的问题。为此,在中共党史研究过程中涉及“问题意识”问题时,我们必须要有清醒认识。

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演进历程所编织出的“问题网络”的繁杂性不亚

^① 近年来有关中共党史学如何更新自身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成果较多,如论文有欧阳淞的《关于党史研究的理论指导问题》(《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4期)、《关于党史研究的理论借鉴问题》(《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5期),张静如的《中共历史研究断想十则》(《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2期),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组织发表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的郭德宏、杨凤城、齐鹏飞、侯且岸等人撰写的系列论文,等等;这些成果集中展现了学界近年来对党史研究理论与方法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为后续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于历史学的其他任何一门分支学科,如何在“难解难分的问题网络”中抽绎出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是对史学家治史功力的考量。因此要学会发问与提供回答。我们在确立研究任何一个“问题”时,都要问一下“问题”的意义在哪。只有当一个史学工作者自觉地从“意义”出发选择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事实时,他的研究态度才不是主观随意的,他的研究成果才可能是客观、科学的。卡尔·波普尔认为:“历史虽然没有目的,但我们能把这些目的加在历史上;历史虽然没有意义,但我们能给它一种意义。”^①“意义”是每一个值得研究问题的内在属性。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来看,任何一项研究都要始于“意义”,又终结于“意义”。历史认识三种形式,即考实性认识、抽象性认识与价值性认识,既是三种认识形式,又是历史认识过程必经的三个层次。考实性阶段的史料辨析、史实叙述工作比较重要,但也只是整个研究过程中的第一步,第二步的抽象性分析论证必不可少,而价值性认识则是最高层次的认识,它反映的也就是“意义”所在。陈寅恪治史的实证精神,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但其动机也是在“从历史中寻一个与现实极为相似的史实加以发明,因为只有找到与现实相应同时也与个人经历和情感能产生共鸣的历史现象,才更适于抒发自己真实的现实感受”^②。简言之,陈寅恪选择史实的动机首先在于“意义”。研究历史,没有一定的对现实生活的感悟和体验,是做不好的。历史学家除了搜集、考证资料之外,最重要的是看问题的眼力,或称之为“史识”。一个好的历史学家,对现实的看法应非常深入。有学者曾总结陈寅恪治学特点说:“就方法而论,上承乾嘉考据学之遗风,而求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以考据为求证史实,解识史事之步骤,然而再就既证之史实,说明其意义,即所谓从史实中求史识。”^③因为任何研究的最终目的还是希望从历史中有所感悟,进而把握到对现时和未来人类社会都有价值的规律性认识。

① 田汝康等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6页。

② 谢泳:《陈寅恪“在史中求史识”一例》,《社会科学报》2013年10月23日第8版。

③ 汪荣祖:《陈寅恪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19页。

中共党史研究范围宽广,课题丰富多样,可有多种治史风格,如有的学者就注重文献整理与考证,因此不应强求把所有研究课题与现实问题直接联系起来。但党史工作者出其所学,为解决当前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服务,在求真的基础上致用,也是应尽的义务。如为国家战略性智库建设提供智力支撑就是中共党史研究之功能所在。研究历史主要是为了解决现实中碰到的问题或是提供借鉴,“问题史学”是联系现实来提出问题,绝不是为了恢复过去而研究过去。正如克罗齐所论,“当生活的发展需要它们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会变成现在的。”^①而历史学家的作用“既不是热爱过去,也不是使自己从过去中解脱出来,而是把过去作为理解现在的钥匙”^②。中共党史研究内容同现实社会有着紧密的联系,有的内容甚至仍然是现实问题,具有直接的借鉴作用,研究它的目的也主要是为国家战略性智库建设提供智力支撑。但值得警醒的是,中共党史研究为国家战略性智库建设提供智力支撑,并不是使学术研究沦为政治帮闲,也绝不是唱几句高调和颂歌,多用几个溢美之词,而是从学理层面为其寻找合法性,从根基上维护它,必须认真地去思考和回答时代课题,要善于发现问题、勇于指出问题,善于从现实问题的前前后后、内外上下的各种联系之中,去把握其本质。卡莱尔曾说过,即将到来的时代已孕育在业已到来的时代之中,虽然还不可见,却在被决定着,塑造着,它的到来是注定了的,不可避免的。无论是已经到来的,还是尚未到来的,它们的意义只有通过二者的结合才是完整的。这就要求我们要站在历史的高度,以更为宏大的视野从事党史研究。抗日战争最为艰难之时,“亡国论”甚嚣尘上之时,作为历史学家的钱穆以卓越的史识断言,中国不会灭亡,因为从历史中他感受到了中华民族旺盛的生命力。^③中共党史研究应当为所处的时代提供正确的历史意识与历史感,去关注一些与当代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领域和现实问题。

① [意]贝奈戴托·克罗齐著、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5页。

② [英]E·H·卡尔著、陈恒译:《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10页。

③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二、实证意识的规训

自乾嘉学派求真求是的考证传统 20 世纪 90 年代复兴以来,实证传统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代中国史学的主流。在这种潮流的影响下,作为历史学范畴内的中共党史学科,也出现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实证的趋向。的确,从中共党史研究的学科特性来说,实证意识是每个研究主体应有的自觉意识,具体而言,即应用坚实的史料说话,让结论从一系列资料中导出。但从具体的党史研究生态来看,“实证意识”本身也存在需要规训的问题,对材料的随意取用、过度解读等诸多现象,如果任其泛滥,就会出现许多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形式化分类的论文,或“相信只要手握独家资料,就占有了历史真相本身”^①的局限,这种看似依据“真材料”进行的研究实则有违中共党史研究的“求真”精神。

在中共党史研究中,以小地方去透视大历史,是一种从纵深处研究历史的努力,是当前学界较为推崇的研究方法,对于揭示历史真相具有积极的意义,但过细的微观实证也会出现偏差。当前在党史学界比较流行一种研究趋向:部分学者致力于地方、社会层面的微观研究,重视地方史料的发掘与整理,取径民间,以区域或地方为个案进行实证研究。一些学者较注重田野调查,在走村访户中获得某些村干部或村民个人的日记、台账之类的材料,这是非常珍贵的历史遗存。但这些所谓的“独家秘籍”是不是克罗齐所说的“在心不在焉或存有幻念的时候记下来的”?是不是“随心所欲地记下来的或存心欺骗别人的”?^②诸如此类的质疑还是必需的。因此,在运用这些材料时,可用注的形式作出一个说明,而不能径直使用。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进一步讲,我们可以确信从地方发掘的这些材料的真实性,但这种实证研究仍存在不少可以讨论的地方。研究“小地方”

① 许纪霖:《没有过去的史学危机》,《读书》1999 年第 7 期。

② [意]贝奈戴托·克罗齐著、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107 页。

的目的在于从地方发掘资料去认识更为底层的社会实态,为全面认识“大历史”提供参考与重要佐证,这几乎成为学界共识。如有学者认为,“史料放在特定空间才能认识。地域空间建立的历史联系性,可以保证历史的整体性,地域史得到的历史认识更反映历史实际,更为深刻。从地域看大历史,有可能建立新的历史体系。”^①由此而言,宏大叙事视野下的党史研究具体到细节、具体到国家政策在地方的贯彻落实、具体到下层民众的研究,则可能失之于欠缺和笼统。在这个意义上,地方化、区域化取向的研究从中央和地方相互作用的角度出发,可以把中共党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如《建国初期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7)——以湖南省醴陵县为个案》一书就是很好的范例。作者选取一个农业大县,以醴陵县档案、地方志、文史资料为基础,做一个县农村基层政权的实证研究,具体展现了中共在新中国成立后划乡建政,使国家权力下移到基层的过程,以及在农村推行合作化以后乡村政权建设方向、任务、运作方式的重大转变,呈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及其社会变迁的复杂图景。^②在该书中,作者自陈,他选取湖南省醴陵县做个案的研究,是想改变国史研究中的宏大叙事框架。而且选取以一个县为研究单位,既符合中国的行政治理传统,更能在方法论上达到“中观”研究的效应,上可溯市、省、中央,下可达区、乡、队、村、组,既关注中央、省级层面大的宏观背景的叙述,更重视对中央、省级政权机关的政策、规定在地方上的落实程度,以及地方的认同与上级制度规范紧张的刻画。由于有此明晰的认识,可以说作者达到了预期的学术目的。

但在更多的研究实践中,还会经常看到两类现象:一类流于地方史,就地方写地方,没有宏观视野,或写成省区史、县史,更有乡镇史、村史等,自动降低了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这种情况暂且不论;另一类则由于过分迷信

① 常建华:《中国社会史研究十年》,《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② 陈益元:《建国初期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7)——以湖南省醴陵县为个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

“小地方”和单纯的田野材料的说明力量,以“国家—(地方)社会”对立的二元观,根据微观社会研究简单否定宏观历史认识,而不去考虑所进行的微观研究是否具有代表性与典型性。这样的研究易于以偏概全,恐怕离历史的真相更远。不知有多少学界前辈一再告诫我们要警惕“抽样作证”,中国地域广阔,多样化的史料很丰富,若只留意局部性的观察,搜罗有利于自己意见的史料,那么几乎任何问题都可以照自己意见的方向去证明^①。特别是有些研究取样较少,到某一地方去寻找一些“特殊现象”,而以之为据大加发挥,动辄就得出一些“颠覆性的结论”,号称要“改写历史”等等,殊不知“特殊现象可能偶然有之,不是群像,在历史发展潮流中不占重要地位,若是过分注意他,反而迷惑读者,甚至也可能迷惑自己!”^②

微观实证中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即通过发掘一个地方的档案史料“解剖麻雀”式地去证明国家某一政策在地方的贯彻实施,这是非常可行的,因为国家政策在各地方的具体实践与实际效果之间经常存在着同一性与差异性,所以说是应该鼓励的研究取向。有的论文确实通过发掘地方多样化的史料,丰富了原有的历史认识;但也有一些论文仍然沿袭了传统的“政策—效果”模式,只是用一些地方材料去还原国家政策实施的过程,做了印证工作,并没有提供新的历史认识。但更为不幸的是,千篇一律的区域形式化分类的论文成批出现。这看似实证化,实为变味的“学术游戏”。学术研究最大的特点是主体性自觉,也就是属于“手艺人”范畴,而不是“流水线操作工”。“手艺人”在掌握了一定的研究方法后,不仅能够用这些方法做前人或先人做过的样式,但最重要的是能够把这些方法灵活运用,进而发现新的问题,展现新的学术可能性。“流水线操作工”则不然,只能按图索骥,程式化操作。有论者认为,他所使用的资料是原始档案,是一手资料,还是有学术价值的,但如果换个区域单元,搜集到的却是大同小异的资料,得出的是大同小异的结论,那么这些研究有什么意义呢?因此,我

① 严耕望:《怎样学历史——严耕望的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② 严耕望:《怎样学历史——严耕望的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页。

们在进行区域空间选择时,首要考虑的是研究对象的空間特征,而不是将研究对象简单地“地域化”或“地方化”。最大的问题还是要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各地发展的状况肯定是有差别的,但如果仍采用同一的提问方式,思考路径一致,结论的趋同性也就是必然的了。法国史家勒高夫提出:“问题史学‘不是一种让史料自己说话,而是由史学家提出问题的史学’。”^①诸如此类排斥问题的“实证”研究只能在无意义的方向上将中共党史研究复杂化。

从事个案实证研究时,我们应将个案史料所反映的客观事实放在历史发展的大环境、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对其开展对比和批判。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准确地把握历史全局,从而一扫那种一味求窄、求细、求小的拘谨姿态。个案所反映的都是经验史实,学术研究需要寻求经验实证与理论抽象之间的良性互动。因为历史学家有双重任务:“一方面,要发现少数意义重大的事实并把它们转变为历史事实;另一方面,把许多影响不大的事实当作非历史加以摒弃。”^②须知历史事实不等于历史真相,历史研究不但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其然与其所以然之间的联系必须有思想深入其中。不科学地揭示历史的规律性与本质,历史研究只能回到史事罗列的古老窠臼里去,倒回去走流水记录的老路,那样的历史,克罗齐曾称之为“假历史”^③。而“假历史”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在越来越小的范围内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多,最终无影无踪地消失在事实的汪洋大海之中”^④。这种取向只把搜集材料当作历史研究的唯一能事,而忽视了对历史的诠释。作为具有极强的考证意识和求真精神的史学家,陈寅恪的历史研究常常从考证具体问题始却不在具体问题终,而是借助考证寻求一些规律性的现象。对此,有学者评析说:“寅恪先生继承了清代朴学考证的传统,但并没有为考

① [法]J. 勒高夫等主编、姚蒙编译:《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② [英]E·H. 卡尔著、陈恒译:《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97页。

③ [意]贝奈戴托·克罗齐著、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2页。

④ [英]E·H. 卡尔著、陈恒译:《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97页。

证所囿。考证学者往往不谈义理,换句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不大喜欢探索规律。但陈寅恪却最注意探索规律,并不就事论事。”^①陈其泰先生总结陈寅恪的具体做法是:“研究每一问题,总是先调集各方面的详细史料,逐条地对史料的可靠性加以辨正,尽可能做到多方参证,追根溯源;对于可靠的史料,进而联系史料的来历、作者的身份背景,进一步判断其可信程度如何;又再进而联系各方面的史料加以疏通、诠释,以明了此一史料所能说明的历史事件或社会情状的真相,究其前因后果;最后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中,综合各方面的史实,阐发历史演进的趋势,求得规律性的见解。”^②这种治史风格还应发扬光大。

三、规范意识的谨守

近年来,中共党史学界对学术规范的重要性已经达成了共识,研究成果的引而不注等不规范现象也逐渐得到纠正。但仅仅做到形式上的规范还远远不够。在当前的研究中,存在着两种较为常见的现象:一是为了出新,重视跨学科研究,注重与西方接轨,但出现了盲目求新求变的现象;二是故步自封,全然无视他人的研究,缺乏最起码的创新意识,因循守旧。这也可以称为中共党史研究的“断裂现象”。学术规范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学术创新,创新是任何学术成果得以成立的前提。事实上,这两种现象都是规范意识淡漠所造成的。

重视跨学科研究是一直在提倡的,但为什么出现了“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的状况?注重与西方接轨也是我们一直在倡导的,但为什么形成了所谓新的“冲击—回应”(即外国学者冲击、中国学者回应)模式?这都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反思的议题。“学科”一词的英文 discipline 指教导,暗含着获得他人所不拥有的专门知识的意味,它在现代的两重主要词

① 季羨林为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纪念陈寅恪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所作的序。

② 陈其泰:《陈寅恪治史风格续议》,《中州学刊》2003年第4期。

义即“学科”和“规训”。借用“规训”这一福柯式的术语,提示我们认识学科作为规范的一面,它具有二重性:知识的与制度的。跨学科是出现于学科分类比较成熟的时期,如在社会科学并不发达的20世纪初年,尽管一些学者如梁启超等,一直在摇旗呐喊,但由于学科门类的界限不明,人们容易将社会科学笼统地当作一个整体,很多使用者并不是有意识地进行跨学科实践,而是随手取用各种理论学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史学危机论的提出,一些学者开始要求改革传统史学研究方法,注重从其他学科中吸取方法论思想,跨学科研究随之出现热潮。有学者在较全面地考察了近年来党史学科的跨学科研究实践后,总结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学科在边缘学科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多,的确也展现出一种新的风格,给党史学界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但是,边缘学科也必须建立在一定的主干学科知识的训练基础之上,否则它就无法进一步发展。”^①对此,笔者深有同感,党史中的跨学科研究是从党史的角度出发,吸收其他学科的方法,把其他专业的问题作为“党史”问题加以研究,而不是从非党史学的角度,借鉴史学的方法,对其他专业某个问题的历史进行研究,如教育问题的研究。中国教育发展的相关问题是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事件,新中国成立后,各级教育随着中共政策的不断变化而发生了改变。因此,新中国成立后的教育问题也是党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但从研究视角与研究进路来看,党史研究中的教育研究与教育学研究是不同的。教育学更关注教育自身的发展,总结教育发展的规律。而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与意旨并不在此,作为历史学的中共党史研究主要采用实证研究,以第一手档案、教科书文本、当事人文集作为史料基础,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更强调是对历史线索的梳理、事实细节的描绘、因果关系的论证,主要是通过教育这一视角去考察执政党与政府的教育政策及其推行的社会背景与效果,以此为切入点去探讨教育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因此,我们在进行跨学科研究时,一定要在

^① 程美东、侯松涛:《2000年以来全国中共党史专业博士论文选题若干问题论析》,《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3期。

学科进路与研究取向上明确定位。

还有一些学者盲目追随西方学界“问题意识”的热潮,出现了大量的“伪问题意识”。尽管当今之势全球化势不可当,但社会的完全同质化(西方化)是不可能的,很多地方的发展状态跟西方是不一样的,双方的社会节奏是不一样的。西方新潮所关怀的核心问题,是从非中国的历史环境中提出来的,如果我们无视自身的国情,亦步亦趋地追随所谓的“新议题”,或许较难蒙其利,反而要先受其害,走上“歧途”。我们不能追随西方学界“问题意识”的热潮,而要质疑这些从非中国历史环境中产生的“问题”和思路,是否与中国自身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所存在的问题相一致。每一位历史学家都是时代与环境的产儿,西方学界的一些学者很著名,很渊博,也有很好的思维路径,但他毕竟根植于他生活的环境之中,根植于他的国家与民族文化氛围里,他有着自己独特的“洞穴”,所以也就会出现他个人的“洞穴假相”,他所追逐的问题是不是我们的“真问题”是首先要考量的。我们可以先横向比较,但纵向比较是不可缺少的步骤。我们应先了解中国的历史,应从中国的角度,从中国在世界所处的位置的角度出发去研究,然后再来评析中国现当代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毛泽东强调,“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共党史的关系弄清楚,就是要看你的屁股坐在哪一边,如果是完全坐在外国那边去就不是研究中共党史了。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如果不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发展,党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研究就不会有结果。”^①这一段话虽语出延安时期,但至今仍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随着中国学者与外界交往

^①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党史研究》1980年第1期。

的增多,以各种形式发生相互影响乃是逻辑必然,但如果对于种种学术思潮只有被动接受,就失去了作为学者最起码的学术判断力。再进一步往深层探究,这种面对外来思潮时的跟风和盲从,并非学术能力上出的问题,而是学者治学的价值取向问题。

另一方面,学术规范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学术创新,中共党史研究应遵循贵在创新的原则。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说:“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①。章学诚认为,“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这样的研究成果“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②,达到历史研究之最高境界。但中共党史研究现状不容乐观,党史学界每年编撰出版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具有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少之又少,重复劳动现象非常严重。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但研究主体缺乏自觉的创新意识是最重要的因素。历史编纂的旨趣,体现了史家对历史本质的认识,对历史研究目的的看法,他们对历史研究主题的选择,对体裁、体例等表述方式的选择,无不与此有关。有着自觉创新意识的史家,一般能够遵循科学的研究路径和具有相应的器识,善于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提出新问题,并在研究结论上有所创新。这就要求党史研究工作者对于自身要有严格的要求。卢奇安评价修昔底德道:“他分清了好史家和劣史家的界限:史家的作品应该成为千秋百世的财产,而不应徒为目前沽名钓誉;他们应该把信史留给后人,而不应同今人哗众取宠。他以实用来衡量历史作品,他规定了英明历史家所应树立的奋斗目标:这就是历史可能重演的话,往事不忘便是今事之师。”^③“好史家”是把“信史留给后人”,“劣史家”是“为目前沽名钓誉”。只有克服了浮躁的、平庸的风气,创新的风气才能得到真正的发扬。一方面,踏踏实实地读书,建造深厚的学术积累,包括资料的积累、知识的积累

① 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卷5《内篇五·中郑》,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64页。

② 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卷5《内篇五·答客问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70—471页。

③ 卢奇安:《论撰史》,转引自章安祺编订:《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08页。

和思想的积累,另一方面要对中共党史研究学术前沿有清晰的认识,在了解其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明确其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和契机。练好这两方面的基本功,才能在此基础上推陈出新。

由于中共党史研究的特殊性,在如何看待中共党史研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的问题上,学界往往有一种“偏见”,认为中共党史研究的政治性、现实性决定了它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而意识形态束缚了学术创新。但意识形态的影响并不完全是负面的,现实政治的需要完全可以成为学术发展的促动力。正确的做法是,意识形态本身一旦成为研究对象,应该对之抱以客观的态度,把研究中的意识形态与现实中的意识形态分离开来。如有学者指出,“当革命成为研究对象时,革命时期的政治话语应一并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而不可直接移用为学术论断,但国内主流革命史学界至今沿用中共革命时期的政治话语作为革命研究的定论,不容置疑。”^①把“政治话语”等同于“学术论断”大概是当前党史研究进行学术创新的瓶颈。早在十多年前有学者就提出中共党史研究话语转换的问题,指出:“意识形态宣传要有说服力,需要对欲张显和遮蔽的东西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和深刻的了解,而学术研究的客观、准确和深入,能为其提供重要的基础、依据或借鉴。所以,促进中共党史学术研究中的话语转换,不但不会削弱中共党史所负有的意识形态功能,反而会使这种功能更为有效,更重要的是它将极大地促进中共党史研究,进一步提高其学术水平。”^②实现“政治话语”向“学术话语”的转换,是中共党史研究破解学术创新困境的最佳路径。

(责任编辑:王婧)

① 王奇生主编:《20世纪中国革命的再阐释》(《新史学》第7卷),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页。

② 杨凤城:《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规范与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建国初期中共党史学科发展状况考察

滨州学院 张立梅

新中国成立后,1949—1956 年间的中共党史研究在理论研究、人才队伍、文献资料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梳理这一时期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进程,总结其经验及不足,对于指导和深化当前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建国初期中共党史学科发展的背景和历史条件

1. 建国前的中共党史研究为学科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理论不断发展,尤其在延安时期,除了研究现实问题外,中共党史研究成为延安学习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当时中央党校、陕北公学、八路军军政大学等党的干部学校,都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课程上,讲授中共党史,并经常开办党史讲座。而毛泽东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从理论上论述了党史研究的对象、任务和分期等问题,并就党史研究的方法作了规定和指导;《六大以前》《六大以来》《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党史资料的系统整理和出版,对于深入探索各个时期党史问题有极大的启发,为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总之,建国前的中共党史研究从研究方向、研究资料、研究人员及课程设置等方面,为中共党史学科基本建设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